

· 新见：传承与发展 ·

过渡带对文明起源的推动作用*

——以两淮地区为例

徐 峰

【摘 要】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其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核心区，也有过渡带。所谓过渡带指两个或多个群落之间，或是生态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交错区域。这类区域既不完全归属于相邻的任一区域，又兼具二者的部分特征，其自身属性在空间或时间维度上往往表现出连续的过渡性。欲深入理解过渡带对文明起源的推动作用，两淮地区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凌家滩文化等典型遗存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先锋力量，而且展现了过渡带在此过程中的文明融汇、宗教整合与文化调适功能。

【关键词】文明起源 过渡带 两淮地区 凌家滩文化

【作者简介】徐峰，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5）12-0113-16

一、引言：区域文明研究蔚然成风

区域研究是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20&ZD247）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委托项目“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吴越文化项目”的资助。

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文明研究蔚然成风,不同学科领域产出了大量具有自身学科风格的成果,各自提出了广泛、多样而富有价值的见解。

在考古学领域,不同区域的考古工作者通过田野发掘获取了大量材料。1981年,苏秉琦等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区域的“区、系、类型”模式,并针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做出六大区的划分,具体包括“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①

1986年,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概念。公元前4000年,因多区域、多方位的互动和不断加深的交流,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共享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大致的地理范围与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一致,因此可以称作“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②张光直不仅描摹了多元的、整体的中国初景,而且以“相互作用”凸显了文明交流的动力,即通过互动融合可以逐步实现文明的一体化、统一化。

1987年,严文明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此即多样性的体现;又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共同发展,亦即统一性的体现。中原地区不仅是地理上的“花心”,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地区,形成“重瓣花朵”的格局。此种向心结构保证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从而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③

迄今为止已进行20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堪称最能体现区域重要性的研究。该工程通过对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和河南偃师二里头等4个都邑性遗址与约20个区域性中心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多学科研究,揭示了各个区域的文明起源、形成历程,以及各个区域因文

① 参见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第12~17页。

② 参见李新伟:《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第4~5页。

③ 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页。

化交融而形成中华文化圈的过程，^① 展现了突出的空间广阔性和长时段性。

随着区域文明研究的不断发展，学界的研究视野也逐渐拓展至更为多样、甚至更为微观的区域，从以往聚焦于大型中心都邑性遗址，逐步转向关注小型聚落遗址。此外，由于中国各地在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地方性差异，若想对中国整体形成更加清晰、更具辨识度的认识，就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关注中国的不同区域。尤其对那些位于中心区域之外的边缘地带，以及处于不同中心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更应予以特别关注。这些区域在宏大的中国历史叙事中常常被忽视或遮蔽，其独特的区域特性与表现形态，以及作为局部在整体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与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与认识。对这些区域开展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多样性的理解，而且能从中提炼出具有理论意义与方法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两淮过渡带及其早期文化面貌

区域通常指具有区别于周边地区特征的相对同质的空间范围。区域之间的差异，可能源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也可能是人为划分的结果，或者是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每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区域，都占据着一定的地理空间，并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发展、不断累积，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历史传统。

依据单项或综合指标可判定区域的特性：有些区域是基本经济区；^② 有些区域是核心区；^③ 当然，也有些区域是过渡带。过渡带是一个在不同学科领域均有应用的概念，^④ 其核心含义指两个相对均质或性质不同的区域、系统、状

① 参见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第5~32页。

② 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朱诗鳌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9页。

③ 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④ 许多学科都有关于过渡带的研究，尤以生态学、地理学最为普遍。参见王颖、季小梅：《中国海陆过渡带——海岸海洋环境特征与变化研究》，《地理科学》2011年第2期，第129~134页；叶正伟、纪旭、刘育秀：《典型南北气候过渡带地区气温的时间变化特征——以淮河流域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年第3期，第122~130页。

态与结构之间存在的,性质发生逐渐变化的中间地带或边界区域。判定过渡特征的主要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降水量、气温、植被类型、方言分布以及人类行为方式等。在中国境内,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存在诸多过渡带,这些过渡带占据的空间范围各不相同。它们在形态、规模及景观特征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属于狭长的“线状生态廊道”,有的则属于内部物种较为丰富的“带状生态廊道”。^① 特定的民族或族群在这些过渡带或生态廊道中长期流动与定居,逐渐形塑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空间场域。

从过渡带视角展开对文明起源的探索,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过渡带有其独特的历史生成过程、内在结构特征及发展动力机制,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其次,过渡带与周边的中心区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地理单元存在密切联系,那么它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可以说,过渡带正是理解不同区域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重要中介。最后,不仅限于文明起源这一特定阶段,从更长远的历史进程看,区域地理结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聚焦于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的若干大型中心遗址,这些遗址有的位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明核心区,有的则位于核心区的边缘地带。然而,就目前文明起源研究的整体态势而言,仍偏重于中心区,而对边缘区关注不足。在古史研究尤其是族群认知方面,也长期存在“内华夏、外夷狄”的二元视角。然而,要全面认识一个整体的中国,构建一幅完整的图景(无论其尺度大小),就必须在结构上同时包含核心区与边缘区。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只有从彼此关联的多元地理区域出发,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内部空间结构及其与外部的复杂关联。^②

今江苏、安徽二省境内的淮北与淮南地区,是以淮河为地理轴线的典型南北过渡带。秦岭—淮河一线大致与我国 800 毫米年等降水量线相吻合,这一等降水量线也是我国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重要分界。同时,秦岭—淮河一线还与我国 1 月份 0℃ 等温线基本一致。在植被分布上,正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所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

① 参见朱强、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廊道宽度》,《生态学报》2005 年第 9 期,第 2406~2411 页。

② 参见麻国庆:《走廊和通道:理解何以中国的空间视角》,《开放时代》2025 年第 1 期,第 66~76 页。

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① 古人很早就对淮河的边界性有形象的描述。

两淮地区处于海岱文化区与环太湖文化区的中间地带，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览中国古代历史，每当国家陷入南北分裂时，两淮地区往往成为南北政权对峙与拉锯的主战场，淮河两岸的归属对国家政权的统一或分裂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清人顾祖禹在其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輿纪要》中总结道：

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陈人失淮南，遂为隋人所并。唐末杨行密与朱温亟战于淮上，温不能渡淮，杨氏遂能以淮南之境与中原抗。五代周取淮南，而李氏之亡不旋踵矣。宋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为唇亡齿寒。”^②

从考古发现看，自距今约 7400 年至 6200 年的北辛文化时期起，淮河中下游地区就已显现出其作为文化边界的显著特征。北辛文化的空间分布以今山东省为主体，其遗址主要发现于淮河故道以北地区。到了距今约 6100 年至 4600 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系统的南缘同样位于淮河中下游一带。此后，在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时期，淮河依旧位于黄淮考古学文化的南部边缘带。例如，龙山文化中的尹家城类型、尧王城类型以及王油坊类型，其分布南界均大体止于淮河；而岳石文化中包括尹家城类型、安邱堽堆类型、苏北类型在内的南缘类型，其南部边界也大多位于淮河一线。^③

从南向北观察，自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在江淮东部地区的原始文化中就已出现来自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的因素，这一现象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和海安青墩遗址中均有明确发现。这表明崧泽文化曾跨越长江，经江淮地区向北传播，直至淮北地带。在刘林、大墩子、万北、小徐庄、王因等苏北、鲁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少量崧泽文化因素；同样地，在崧泽

① 张纯一撰，梁运华点校：《晏子春秋校注》卷 6《内篇杂下》，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290 页。

②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887 页。

③ 参见徐峰：《一水分南北：从考古与文献材料谈淮河的早期“边界”性》，《南方文物》2023 年第 1 期，第 145~151 页。

文化遗址中，也能见到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存在，^①如长江南岸的武进寺墩和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遗址都发现过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②显然，这些文化因素是通过中间的过渡带实现交流与传播的。

到了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在位于江淮东部的青墩遗址第三期（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中，出现了较多具有明显良渚文化特征的遗物，如黑皮陶贯耳壶、敛口钵形豆、有肩扁平穿孔石斧、有段石铤，以及采集所得的琮、璧、瑗、镯、坠等玉器。这表明青墩遗址在第三期时很可能已经被纳入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③近年兴化、东台蒋庄—五星遗址中良渚文化中晚期墓地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江淮东部曾为良渚文化北上的前沿地带。^④再往北，在阜宁陆庄、^⑤新沂花厅^⑥两个遗址，都存在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因素，反映了过渡带的“文化两合现象”。^⑦由两淮地区可见，过渡带在时间或空间维度上往往表现出连续的过渡性，这一特殊的地理区位在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塑造丰富多元的文化面貌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之一。

-
- ① 参见栾丰实：《论大汶口文化和崧泽、良渚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62~81页；郝明华：《苏皖江北地区的崧泽文化因素》，《东南文化》2001年第5期，第18~23页。
- ② 参见余官珣、于成龙、陈钰：《江苏常州寺墩遗址》，《大众考古》2024年第7期，第12页；南京博物院编著：《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 ③ 参见燕生东：《海安青墩遗存再分析——江淮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之一》，《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第33页。
- ④ 参见林留根、甘恢元、闫龙：《兴化、东台蒋庄—五星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主编：《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7页；南京博物院：《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第19~31页。
- ⑤ 参见南京博物院、盐城市博物馆、阜宁县文化局：《江苏阜宁县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4年第6期，第7~21页；栾丰实：《论陆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0年第2期，第89~96页。
- ⑥ 参见南京博物院编著：《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1页。
- ⑦ 参见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52页。

三、凌家滩文化：文明起源的过渡型样本

过渡带的地理区位是区域内文化开启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基础与必要条件。从现有考古材料看，作为两淮地区的关键文化遗存，凌家滩文化为探讨过渡带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

凌家滩文化距今约 5800 年至 5300 年，该文化遗址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凌家滩遗址的布局结构清晰，包括内外双重环壕、普通居住生活区、大型公共广场遗迹、高等级墓地以及祭坛等。生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同时饲养猪、狗等家畜，辅以狩猎与采集活动。主要手工业为玉石器加工。凌家滩遗址迄今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 3000 多件，其社会内部贫富、阶层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①

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其所出玉器以数量多、技艺高、制作精闻名，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视角看，凌家滩文化处于一个居中的位置。当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长江下游乃至更偏南的地区发生文化交流时，凌家滩文化恰好位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与中介作用。

在具体的玉器器类上，凌家滩遗址的诸多发现见证了史前时期不同区域之间远距离的文化互动。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曾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二者不仅在玉器种类、琢玉技艺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在更高层次的宇宙观与礼仪体系方面具有颇多共通之处。现以几类典型玉器为例略作说明。

玉人。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 M4 出土了一件玉人。该玉人呈半裸状态，身体两侧轮廓线条较为平直，通过内收的颈部与腰部，将整个身体清晰地划分为头部、胸腹部和腿部三个部分。^② 与此相对，凌家滩遗址也出土了六件玉人雕像，姿态均为双臂弯曲，双肘上举贴于胸前，双手叉开。这一姿态与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人基本一致。有学者指出，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应与彼时

① 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参见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文物》2008 年第 10 期，第 81~82 页。

南北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①

斜口筒形玉器。红山文化典型玉器之一，仅牛河梁遗址就出土23件，传世和各地收集的有20余件。斜口筒形玉器器形简单，无纹饰，中空，一端为斜口，一端为平口，平口处有钻孔。凌家滩遗址也曾出土与之非常类似的玉器。在2007年发掘的凌家滩遗址M23中，墓主人的腰部正中位置放置有一件玉龟与两件玉龟状扁圆形器。这三件器物呈扇形排列，其中最东端的一件玉龟器形完整，其腹腔中空，腹甲一端为平口，另一端呈圆弧形，腹甲表面还精细琢刻成龟甲的纹样，可以确认为一件标准的玉龟形器，与两件玉龟状扁圆形器应为一套组合器物。^②凌家滩玉龟形器的发现对理解斜口筒形玉器也有帮助，有一种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的原型就是龟壳。^③

介字形玉冠饰。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的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出土了一件玉冠饰。该玉器甫一出土就引起考古学界高度关注，因为这件冠饰与凌家滩文化的一件玉冠饰高度相似。这件红山文化介字形玉冠饰由两部分构成：上部为中间高耸的尖顶，两侧向外卷曲；下部凸起，可固定于某物的顶部。^④与之相比，凌家滩遗址87M15出土的介字形冠饰的形制更为新颖：整体呈尖锐的三角形，两端各附加一个圆形镂孔，正中则开有一个三角形镂孔，底边呈长方形，两端还各饰有一对钻孔。^⑤这件凌家滩玉冠饰是体现史前文化空间过渡性与时间绵延性的一个极佳例证。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凌家滩文化的玉器制作传统被良渚文化继承、吸收并进一步创新发展。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可以见到大量介字形设计，其中与凌家滩文化玉器最为相近的是瑶山M12-2789琮节面的图案。在该图案中，神人亚腰倒梯形面部

① 参见严文明：《凌家滩玉器浅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8页。

② 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第10页。

③ 参见黄翠梅、郭大顺：《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凌家滩的启示》，杨晶、蒋卫东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中华玉文化特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58页。

④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24年10月11日。

⑤ 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40页。

与兽鼻之间有一个清晰的介字形图案。^①然而，这一细节隐匿于繁复的神人兽面图像中，长期以来为研究者忽视。

玉版。凌家滩遗址 87M4 出土了一件玉版，长方形，体扁薄，平面略弧，两端略内弧。玉版中部偏右琢一小圆，在小圆内琢刻方形八角星纹，小圆外琢磨大圆，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为八个区块，每个区块内琢磨一圭形纹饰。在大圆外沿圆边对着玉版四角各琢磨一圭形纹饰。出土时长方形玉版夹在玉龟背甲、腹甲之间。^②玉版体现了方和圆的组合与“四方—中心”的宇宙学图式。方圆组合在红山文化遗存中也有鲜明体现。在牛河梁的丘陵山地上，红山人修建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建筑，有圆形的祭坛和方形的积石冢。^③从形态看，红山人已经掌握几何学知识，用石头砌出了规整简洁的方圆建筑结构。而在良渚文化中，经典的玉琮也是方圆一体的——负责切割的工匠已具有方和圆的意识，掌握了圆出于方的知识，玉琮方圆嵌套结构反映了几何学和天文学知识。^④牟永抗较早注意到良渚玉琮的展开图与凌家滩玉版在形制结构上的相似性。^⑤

反映红山文化南传影响的玉器还有双孔和三孔连璧。这类源于红山文化的玉器在凌家滩、海安青墩、^⑥南京浦口营盘山、^⑦湖北黄梅塞墩^⑧以及宜兴下湾^⑨均有出土，可见红山文化对江淮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影响。^⑩红山文化

①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1、183 页。

② 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7 页。

③ 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8 期，第 1~17 页。

④ 参见邓聪、朱章义主编：《金沙玉工Ⅱ——玉石琮工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0~103 页。

⑤ 参见牟永抗：《关于璧琮功能的考古学观察——良渚古玉研究之一》，《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37~449 页。

⑥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159 页。

⑦ 参见魏正瑾：《南京市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4》，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3~104 页。

⑧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黄梅塞墩》，文物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3~264 页。

⑨ 宜兴下湾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双孔连璧，系笔者 2018 年参观宜兴市博物馆库房时所见。

⑩ 参见田名利：《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研究》第 15 辑，黄山书社 2007 年版，第 79~90 页。

自北向南,分别与大汶口、龙山文化乃至良渚文化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从自南向北的视角看,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对凌家滩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偶合式璜、半球形隧孔珠、三角形坠饰等装饰品类在两种文化中均有出现,并且形制较为相似。

玉人、玉龟、介字形玉冠饰等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玉礼器,广泛出现在北起辽西、南至江淮的广大区域内。这些玉礼器的广泛分布,既反映了各地区权贵阶层在原始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共通性,也暗示了一个更大范围内文化趋同过程的悄然发生。

凌家滩遗址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在文化交流中占据了重要枢纽地位,发挥了文化融通的关键作用。这一地理与文化优势,正是促成凌家滩文化在距今约5500年前后崛起为中国大地上若干早期古国之一的关键因素。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这长达1000年的时间段,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气势恢宏的坛、庙、冢建筑群,与安徽凌家滩遗址随葬上百件精美器物的高等级墓葬几乎同时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私有制、阶级分化以及具有准国家性质的早期政治实体相继萌生并逐步成形。因此,从文明起源的角度而言,对公元前3500年这一关键节点的深入探索,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孕育与形成的重要起点。^①

要更深入地认识凌家滩文化的社会性质,有必要将其与在空间上相邻、时间上紧随其后的良渚文化进行简要比较。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早期国家与王权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出代表,^②其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1)良渚古城,长江下游的超大型都邑城市;(2)水利系统,良渚人在古城以北修建了长达10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3)莫角山宫殿基址;(4)遍布环太湖地区的高等级墓葬;(5)发达的稻作农业;(6)数量庞大的玉器,包括琮、璧、钺等;(7)蔓布的神徽。

这些发现反映了良渚文化的以下特点:史前农业和手工业取得长足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已趋于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掌控;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城市;社会贫富与贵贱的分化日益加剧,产生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

^① 参见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第40~49页。

^② 参见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第22~28页。

塔顶端，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王；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战争与暴力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① 凡此种种，表明良渚文化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

从整体文化性质看，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凌家滩遗址是彼时巢湖流域规模最大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周围密集分布着一些中小型聚落，遗址核心地带带有高等级建筑区、贫富分化的墓葬区、随葬数量庞大的玉器等。不过，在城市化的复杂程度上，凌家滩遗址仍不及良渚古城遗址；在与周边聚落的关系方面，其社会层级结构亦不够清晰，尚未形成紧密的社会组织网络。从玉器方面观察，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玉版、C型龙、龙首形玉器等在造型设计上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玉版，在周边其他文化中难觅与之完全相似的器物。然而，这些器物迄今为止均仅发现一件，显然并未进入批量制作阶段。尽管这些器物可能因其稀缺性而具有某种“限量版”的珍贵意义，但是囿于数量稀少、未能广泛流传，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难以形成持久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这也多少折射出凌家滩文化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局限。此外，在玉石器生产方面，凌家滩文化目前已发现的玉石作坊在专业化程度及数量上都逊于良渚文化。凌家滩的玉器生产尚未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制作体系，在整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良渚文化则不同，大量玉琮、玉璧以及遍布玉器表面的神人兽面纹，标志着良渚文化玉器的生产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高峰。良渚玉琮上雕刻的神徽代表的是古代江南地区在神灵崇拜方面形成的统一信仰，是一种广域性的意识形态共识。这一神徽不仅强化了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而且使超越地方群体的意识形态整合成为可能。透过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良渚文化在整个环太湖地区拥有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权力结构与宗教信仰体系，这与良渚文化作为早期国家和王权典型形态的历史定位高度契合。

再看纪念性建筑。修建祭坛通常需要动员大量人力与多种资源，涉及严密的规划、组织与协作，因此只有在具备一定人口规模、社会分层明显、出现权威与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出现。祭坛在本质上是社会权力的象征与表现形式。目前，凌家滩文化仅发现一座祭坛，而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已发现多处祭坛，如瑶山、汇观山、卢村、大坟墩、寺墩、赵陵山、邱承墩、

^① 参见王巍：《中华 5000 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 年第 2 期，第 71~74 页。

福泉山、达泽庙等。

此处对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若干要素进行比较,并无贬低前者、抬高后者之意,而是旨在通过这种横向对比,更加清晰地认识和把握凌家滩文化自身的性质与历史地位。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在社会形态的复杂程度方面,还是在玉器工业的发展水平方面,凌家滩文化都可以视为良渚文化的先声,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扮演了先锋性的重要角色。

如果说良渚文化代表了一个区域性的、较为成熟的早期国家与文明形态,那么已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凌家滩文化则可被视为“文明的曙光”。换言之,从历史发展的线性角度看,凌家滩文化属于正在向良渚文化代表的那种更为成熟、更为复杂的文明形态过渡的一种文明形态。

四、过渡带在文明起源中的三重功能

作为两淮过渡带的枢纽,凌家滩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率先迈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力量。^①以凌家滩文化为例,可以深入分析过渡带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的三重功能。

(一) 过渡带的文明融汇功能

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过渡带,两淮地区在景观生态学上具有典型的廊道特征。这种廊道的连通性既促进了区域内生物群落与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也为某些特定物种提供了临时的栖息地。^②过渡带的文明融汇功能促成了资源、文化与人群的多样性,进而推动社会朝着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石器可以看出,其背后存在一个围绕玉石资源展开的复杂网络,包括玉石原料的获取、控制、运输、分配乃至可能的贸易活动。这一高层次的资源交流网络,甚至与远在辽河流域的红山社会产生了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以玉石为核心的各类资源曾集聚于凌家滩遗址。这些玉石资源既有来自遗址周边的,也有从其他地区输入的。正是这种资源的集聚与流通为社会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也催生了以玉石的占有、分配、使用

① 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序”,第 V 页。

② 参见徐峰:《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南徙路线重建——兼论江淮地区的“廊道”性》,《中原文物》2012 年第 2 期,第 25 页。

(甚至还可能包括贸易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种动力的助推下,凌家滩遗址崛起为一个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左传·哀公七年》中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①堪称过渡带在文明融汇与资源整合方面所起作用的生动写照。位于安徽蚌埠怀远的涂山是两淮过渡带的又一重要枢纽。^②“执玉帛者万国”既是资源集聚的象征,也为我们理解凌家滩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启示。这一历史事件堪称两淮地区早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辉煌时刻。四方诸侯汇聚于过渡带中的一个枢纽之地,他们摒弃干戈,带着玉帛而来,彰显了统一性、和平性与包容性,也让我们得以发掘“文明中国”特质的最初萌芽。当然,资源聚集影响下的社会发展还需要军事力量的保障,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大量玉石斧、钺,它们是军事权力与威仪的象征。

(二) 过渡带的宗教整合功能

原始宗教与祭祀在文明起源中也曾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仪式、符号、纪念性建筑等在人类社会留下深刻烙印并发挥特殊功能。在凌家滩文化中,原始宗教与祭祀活动皆有其物质遗存:玉鹰、玉版等承载精神观念的器物,表明当时可能已出现生产知识和思想观念的群体;祭坛、祭祀坑及可能用于占卜的玉龟等证据,揭示权贵阶层可能已掌握“通神祭祀”的权力。近年凌家滩遗址新发现的祭祀坑出土石器 140 余件、玉器 70 余件、陶器 40 余件,其中包括凌家滩迄今所见最大的石钺、玉璜以及一件龙首形玉器。祭祀坑所在区域应为一处台基,是凌家滩先民堆筑的大型祭祀场所。^③通过凝聚集体信仰、整合社会资源,原始宗教与祭祀活动不仅显著增强了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加速了知识、技术的积累,而且在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推动阶层分化与权贵家族形成的关键动力。^④祭祀坑与大量玉礼器的存在,共同指向两淮过渡带在

① 《春秋左传正义》卷 58《哀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697 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2 页。

③ 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22 年 12 月 8 日。

④ 参见王巍:《论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王巍等:《溯源中华文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 年版,第 166~169 页。

距今约 5500 年前可能已形成一套相对统一的神灵信仰体系，而对该神灵信仰的尊崇与皈依，则进一步促成了人口与物资向凌家滩遗址集中的机制建立。

不过，原始宗教与祭祀活动的过度发展亦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给社会进步带来阻碍。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中，适量建造纪念性建筑、制作精美器物本属合理现象。然而，一旦出现无节制地生产与消费此类物品的倾向便过犹不及。频繁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营建规模庞大的祭祀场所、制造奢华无度的神器以及讲究排场的厚葬习俗，均须消耗大量劳动力。当此类消耗超出社会生产力的承载极限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社会组织的损伤和衰落。

（三）过渡带的文化调适功能

在探讨过渡带对文化互动的影响时，学界对过渡带的文化调适功能关注相对不足。这一功能与过渡带自身的“脆弱性”在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二者既相互依存，又动态转换。国际生态学界在 1987—1988 年提出生态环境脆弱带概念：

在生态系统中，凡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之间所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带”的空间域，即称为生态环境脆弱带。^①

界面的脆弱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可被代替的概率大，竞争的程度高；
2. 可以恢复原状的机会小；
3. 抗干扰的能力弱，对于改变界面状态的外力，只具相对低的阻抗；
4. 界面变化速度快，空间移动能力强；
5. 非线性的集中表达区，非连续性的集中显示区，突变的产生区，生物多样性的出现区。^②

故此，过渡带区域通常具有高度的可渗透性。《金史·完颜宗浩传》载：“夫藩篱之固，当守信义，如不务此，虽长江之险，亦不可恃，区区两淮之地，何足屏蔽而为国哉！”^③可见过渡带界面变化速度之快。

在凌家滩文化时期，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皖西南的薛家岗文化以及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是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玉器、石器生产制作中心。

① 牛文元：《生态环境脆弱带 ECOTONE 的基础判定》，《生态学报》1989 年第 2 期，第 97 页。

② 牛文元：《生态环境脆弱带 ECOTONE 的基础判定》，《生态学报》1989 年第 2 期，第 98 页。

③ 《金史》卷 93《完颜宗浩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078 页。

玉器在当时是技术含量极高的产品，其生产涉及的资源获取与分配体系，不仅是物质财富的集中体现，而且深刻影响社会权力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几乎可以肯定存在跨区域、跨阶层的资源竞争与冲突。目前学界虽尚未找到确凿依据证明凌家滩文化曾受到其他区域干扰（以及这种干扰的具体程度），但若从外部社会视角探寻凌家滩文化的消亡原因，笔者认为从外域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竞争关系切入是较为合理的。由凌家滩及其周边玉石产区至良渚文化早期已逐渐衰落，而其核心工艺传统被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继承看来，这种区域间“此消彼长”的现象正是社会资源再分配造成的。

如前所述，过渡带在文化互动中发挥着廊道作用。廊道既有可能促进斑块间的基因交换和物种流动，方便不同斑块中同一物种个体间的交配，增加物种的空间运动与重新迁入的机会；也有可能造成生境破碎，或引导外来物种（甚至是天敌）侵入，威胁乡土物种生存。^① 过渡带是文化交融与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这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调适功能。

将视线拉长，两淮过渡带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尤能反映这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冲突。进入商周时期，中心－边缘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已然成形。强势的商文化开始向外扩张，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两淮过渡带的一些小型政权奉商为宗主国。西周时期，周人与两淮地区的淮夷展开了反复争夺，周人的经略极大影响了两淮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淮夷族群联合体的形成，正是两淮地区为遭受周人军事打击的东夷提供了容身之地的结果：西周早期，本居山东的夷人向南迁徙，最初落脚于淮北地区；西周中期，随着周人势力进一步南下，他们又迁移至淮南地区，此即金文中“南淮夷”的由来。频繁的移民活动与族群聚合，直接推动了淮夷族群联合体的发展。进入春秋时期，本就矛盾交织的两淮地区陷入更多势力（以吴、楚二国最为突出）的纷争之中。随着大国争霸的愈演愈烈，两淮间原本存在的众多小型政治实体逐渐被兼并。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蛮夷戎狄”的族群分类体系中，“夷”是最早被纳入华夏文明体系的群体。这种历史轨迹的形成与两淮过渡带发挥的特殊作用密不可分——无论是从中心向外围的文化拓展，还是向心式的文化流动，两淮过渡带都处于文化互动的最前沿，促使其成为华夏文明融合进程中率先响应的区域。

① 参见徐峰：《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南徙路线重建——兼论江淮地区的“廊道”性》，《中原文物》2012年第2期，第25页。

五、结语

苏秉琦曾基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提出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裂变、撞击与融合。^①其中,裂变主要发生于区域内部,如距今约6000年的元君庙等墓地的合葬墓反映出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撞击指不同区域间的互动碰触;融合则对应多种文化交融产生的文明火花。事实上,这三种模式普遍见于不同区域的文明起源过程中,只是其发生频率与表现程度不同。过渡带的裂变、撞击与融合不仅发生频率更高,而且表现程度往往更深,这显然与过渡带通常处于与周边地区互动的枢纽位置有关。

就文明起源的发展线索而言,凌家滩文化的考古证据表明,这支文化已经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裂变。凌家滩遗址墓葬已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其社会内部资源分配已经出现不均。文明起源的融合模式在凌家滩文化中同样有所体现,过渡带的文明融汇功能促成了其资源、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作为两淮过渡带的枢纽,凌家滩文化遂成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扮演了文明起源先锋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凌家滩文化的发展也难免存在不稳定性,文化互动中的撞击令其面临严峻挑战。

从宏观的文明起源视角看,对多元区域模式与路径的探索,有助于构建更为立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图景。过渡带的文明进程绝非局部现象,而是牵动全局的关键环节。在区域空间中认识过渡带的独特性,可以为理解周边区域的文明进程提供重要参考。进一步说,除了上述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过渡带研究的现实价值同样不可忽视。过渡带的宗教整合功能增强了其内部的凝聚力,而文明融汇与文化调适功能则推动了不同文化的深度融合——经典史事“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对此的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独有的统一性、和平性与包容性,也正是在位于两淮过渡带枢纽位置的涂山,获得了历史性的彰显与见证。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06~111页。